

杨联陞 著

国史探微



出版社

本书说明

一

杨联陞先生(1914——1990),字莲生,早年就读于清华大学经济系,在陈寅恪先生指导下完成毕业论文《租庸调到两税法》,嗣后赴美,就读于哈佛大学历史系,获硕士与博士学位,即留哈佛任教,五十年代当选为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著有《晋书食货志译注》、《中国史专题讲授提纲》、《中国货币及信贷简史》、《中国制度史研究》、《汉学散策》、《汉学论评集》、《中国文化中报、保、包之意义》等。在论其生平与学术的文字中,尤详备者当推其友人周一良教授的《纪念杨联陞教授》和其学生(也是他最器重的学生)余英时教授的《中国文化的海外媒介》,前者载于《中国文化》第六期;后者载于《时报周刊》三〇九、三一〇号,又分别收入作者在台北和上海出版的论文集《犹记风吹水上鳞》和《钱穆与中国文化》,读者可以参看。

二

在西方汉学界和中国史学界,杨联陞的学博识卓,是同行一致公认、咸相推服的,学者或誉之以“茂堂小学竹汀史,君兼其长非模拟”(吉川幸次郎句),或比之为“东方伯希和”。而要以周一良教授与戴密微(Paul Demiéville)教授的概括最为探本得要。周云:

莲生的学问包括中国历史与语言两大方面。语言兼及古代和现代,历史则上起先秦,下迄清末,领域涉及经济、社会、政治、文化、宗教,以至考古、艺术等部门。他善于发现问题,从大处着眼,小处着手,由小以见大。论著每多创获,深得陈寅恪先生学风的三昧。

戴云:

杨联陞的学问出于他把一己的才性运用在中国最好的博雅传统上面。因此他擅长于对浩博的资料进行精密的分析并从而得出综合性的结论。(《汉学散策》序)

本书的每一篇论文,都可作为上举评价的例证。

三

我们试以作者六十年代在法兰西学院所作的演讲《从经济角度看帝制中国的公共工程》(《兴建考》)为例,来窥作者治学特点的一斑。首先是对史料的广泛占有。作者在文中引到了张仲礼教授的成名作《中国绅士》,称赏“这个扎实的研究,应用了各式各样的材料”,而这正不啻是夫子自道。在本文中,作者引录所及,从经史要籍到小说笔记,从方志别集到考古资料,真是百体皆备,巨细不遗。这自然不是急就而能成功的。关于这一点,余英时教授有亲切的记述:

杨先生的基本功力自然是在中国史学方面,他的每一

项研究专题都是先在中国史籍方面积累了丰富的证据,然后才加以整理。这是继承了清代以来中国朴学的传统……大体上说,杨先生平时在一定范围内博览群书,现代社会科学的训练则在阅读过程中发生部勒组织的作用。读之既久,许多具体问题便浮现脑际,而问题与问题之间的层次和关系也逐渐分明,这时有哪些专题值得研究,并且有足够的材料以供驱使,都已具初步的轮廓,然后他才择一专题,有系统地搜集一切有关材料,深入分析,综合成篇……总之,杨先生的论著都是读书有得的产品,他所提出的问题无一不是从中国史料内部透显出来的真问题,不但有客观的基础而且具自然的脉络。

以这样的治学态度、据这样的治学程序来从事学术研究,才能发现真问题、解决真问题,才能不流于拼凑剿袭、信口开河,才能使这一篇精粹的论文远胜过一部乃至多部充塞着水分与杂质的所谓专著。而作者犹不自满,遗憾本文“材料尚未收集完全”。在文末他特别提醒说,中国历史文献固然存在显而易见的局限,但仍然是“一笔丰富的材料”,希望本文能“显示利用中文文献对一个有意义的题目做深入的研究是会有成果的”。同意这样的结论是容易的,因为事实已经摆在这里;但效仿这样的榜样却不容易,因为那需要并非人人都具备的能力和耐力。

四

其次是对史料的准确把握。占有史料还只是第一步的工作,由于语言随着时代而发生变化,同一个词在不同的时代可能有不同的涵

义,呈现出复杂的形态,使后人或根本不解,或发生误解,这就需要具备一定的训诂学素养,对史料加以严格的鉴定与准确的理解。作者反复强调他的基本立场是以“训诂治史”,指出:

要研究中国史的人必须具有起码的训诂学素养。够不上这种要求的研究者,只能算是玩票性质,而不会成为一个全健的汉学家。毕竟中国史的主要资料仍旧是典籍,虽然考古材料与口耳相传的掌故也很重要。训诂学的一大法宝——典籍考证学能够使研究工作者在使用文献的时候,保持高度的谨慎。一旦有了一份典籍,其他训诂学的技巧就能够帮助研究者正确地去了解它的意思。我得承认这些东西并不就构成汉学的全部,但它们确实是汉学的基础。

作者对此举例作了阐发,其中之一是汉学名家魏復古(Karl A. Wittfogel)在他的名著《东方专制论》(Oriental Despotism, A Study of Total Power)中由于对汉代碑文的理解不确,从而对历史作了远离事实的描述分析,足见在文字理解上差以毫厘,可能导致在史实认识上谬以千里。十余年后,作者在新亚书院的“钱宾四先生学术文化讲座”演讲时还特别提到这一点(《中国文化中报、保、包之意义》引言)。

五

再次是对史料的高明综合。作者是受过社会科学严格训练的现代学者,他重视训诂,但并不作那种可作可不作甚至作了不如不作的鸡蛋里挑骨头式的训诂,而是通过关键词语的考释,来揭示历史的真

相及其所蕴含的意义。在前引新亚书院演讲中，他明言特别“令我向往的是考据而兼义理的训诂创见”，并对陈寅恪先生“依照今日训诂学之标准，凡解释一字即是作一部文化史”的观点作了推阐，指出由于“一个字牵涉许多重要事物，则其研究皆可构成一部（不必是全部亦不可能是全部）文化史”。在《兴建考》中，作者通过对“均”和“和”这两个概念的贯通诠释，将各种有关的史实作了综合分析，为“凡解释一字即是作一部文化史”作了示例。他声明：

在思想的领域里，作划地自限的研究并没有什么好处。因为人们思考的时候，总不会把自己限制在某种学科或哪一门科学所界定的特殊范围内。我主张将经济思想放入整个历史背景中讨论，特别应重视经济思想与有关政府功能的观念、社会上种种人群的角色、甚至于超自然的可能影响力三者间的关系。我将从两个十分密切的主要概念“均”与“和”（平等化与协调化）的重要性出发，开始讨论。继这两个名词的讨论之后，我将先谈谈整个帝制时代，中国人为调和治者和被治者之间经济的和非经济的欲望需求、调和社会上各种人群间的利益冲突，还有调和长期、短期的观点所作的种种努力。

通过对史料的广泛占有与准确把握，从各种表面上似无牵涉的现象中找出其中的关联，进而加以富于条理的综合，从而“不但让历史学家们能够重建一个相当清楚的公共财政图像，而且也能重建一些民众生活史的外貌与细节”。超卓的综合能力透露出他湛深的理论素养，只是既已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境界，“因此他从不把西方的概念强加于中国材料之上，他的社会科学的修养融化在史学作品中，而不露斧凿的痕迹：这是所谓‘水中盐味’，而非‘眼里金屑’”（余英时语）。作者的这

种治学风格,应该也是得之于陈寅恪先生的真传的。

六

作者生前曾自订中文论文十四篇及书评五篇,编为选集,冀在北京出版,可惜书出他已不及亲见,这就是1992年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的《杨联陞论文集》。本书则是他的英文论文选译集,译文曾经作者审订首肯^①,1983年由台北联经出版公司出版。现在改版重印,以广其传,应该是很有意义的。以本书的论题之广,考索之精,相信有关文史领域的研究者,大抵都可以从中获得有益的启示;而有心取法乎上的初学者,也可以从中领略到真正高水平的学术研究风范。

傅 杰

1997年12月

① 译文中也还有一些细枝末节的问题,我们作了改动。如有一处提到“英译《史记》中的《陈涉列传》”,我们把“列传”改正为“世家”;还有一处提到吴承洛的《中国度量衡制度史》,我们删去了误衍的“制度”二字。

自序

岁暮天涯，时觉岑寂。忽然接到联经出版事业公司寄来的《国史探微》全书分页校样，知道此书不久可以问世，为之一喜。

此书共收我的论著十四篇，原作都是英文（只有第二篇附录《朝代间的比赛》是中文原作）。联经公司分请六位学人（大名见后）给译成中文，又请人校阅过，今年七月下旬，我来台开会（院士会议）得以抽暇看过全部译稿，很欣赏译笔之忠实畅达。我除了对各位译者深致谢忱之外，只建议了极少数的小修改，并且增加了若干条按语补注。现在重新校阅，发现全书三百九十几页，文中只有二十几处需要改动。足证联经各位先生编辑校印之认真，可敬可感。在附录又看见为我特别编制的中外文著作目录，已经十得其九。多费清神，统此致谢！

联经公司选定这十四篇论著时，曾同我的挚友余英时教授（耶鲁大学史学讲座）商量。书名《国史探微》大约也是与余教授商定的，意兼嘉勉。我喜其简洁，欣然同意。中国人治中国史，自然是“国史”。“探微”可释为力求深入，探索精微，是撰文的目标主旨，能达到几成则不敢说。友人厚意勸勉，自应致谢。

十四篇的排列，大抵依照论文的性质，以类相从为序。第一篇《中国的世界秩序》（邢义田译），第二篇《朝代兴衰刍论》（陈国栋译）包罗较广。第三篇《作息考》（梁庚尧译），第四篇《女主考》（林维红译），第五篇《人质考》（张荣芳译），第六篇《明代地方政府》（张永堂译），这四篇是社会史政制史。再下六篇（即第七至第十二篇）是经济史（陈国栋译，连前共译七篇）。末后第十三、十四篇是史学史（张荣芳译，连前共译三篇）。各位译者下笔都很细心。对各篇引用的文字，尤其是要转

回中文时，费时查对，不厌其烦，对读者大有补益，我深为感激。

关于这十几篇写作之因缘，问世之先后，想补充几句说明。第一篇《中国的世界秩序》，是为了费正清教授(J.K. Fairbank)主持的一个专题讨论会写的。会在一九六五年九月，论文集由费教授主编，于一九六八年印布。卷首有一扉页说是全体撰写人献此书与哈佛燕京中国史讲座教授杨联陞。我受宠若惊。回想在会中可能说话太多，有时近于讲演。但如“蕃”“番”“藩”三字用法之同异似不能不论。第六篇《明代地方政府》，是为了参加贺凯(C.D. Hucker)教授主持的明代政制讨论会，时在一九六五年八月，论文集则在一九六九年印行。这一类的讨论会，前后参加过六次。每会都有十几篇论文，共同讲评，颇费心力。这一年八月九月连续开会，当时情绪亢奋，健康可能已受影响。近十几年有邀请的唐史会、法律史会、道教史会，都辞谢了。

第三篇以下，除了第六篇与第十四篇之外，都曾在《哈佛亚洲学报》(简称 HJAS)发表。后来分别收入我的两部论文集，即《中国制度史研究》(一九六一)与《汉学散策》(一九六九)。论著目录没有分列各书所收单篇文字。《制度史研究》共九篇，皆见于 HJAS，《汉学散策》共十四篇，分见于 HJAS 及《通报》等处。

本书第十一篇发表最早。《晋代经济史释论》是我的博士论文《晋书食货志译注》的引言。论文是魏楷(J.R. Ware)教授指导的。一九四五年冬交入，一九四六年二月成博士。因魏教授是 HJAS 主编，一九四六年即已印出。他认为我的论文虽坚实而有时太拘谨，很少断语推论。此题确尚有不少可以发挥之处。但我当时还是学徒，岂敢放言高论。次早问世的是第十三篇《二十四史名称试解》，曾在美国东方学会(AOS)宣读大旨，在一九四七年 HJAS 发表。《朝代兴衰》、《作息考》等文也曾各学会的年会用近十五分钟乃至半小时发表节略。记得陈荣捷教授在会后曾劝我多批评西人滥用的朝代循环论，所以后有《朝代间的比赛》补充，尚有余蕴。

第十四篇《唐至明代官修史学》是一九五六年在伦敦大学举行的

亚洲史学史讨论会特邀撰写的。此会规模不小，中国史有英、法、德、荷各国的汉学家撰文。美国只请了拉提摩(Owen Lattimore)与我，而我又是唯一的华人撰文者，在会中不免说话稍多。有一次会后，伦大的老西门教授(W. Simon)笑用中国话对我说：“你是盟主。”我说：“那可不敢当。”大会也请了法国汉学泰斗戴密微教授(Paul Demiéville)，戴老不能来，只补写了论章学诚一文，很多精采。若戴老来作盟主，可以当之无愧。大会中国史日本史部分的论文，合为一册，题为《中国与日本的史学家》(Historians of China and Japan)，由毕斯雷(W.G. Beasley)与浦立本(E.G. Pulleyblank)两教授合编，一九六一年出版。但在此之前，有些文章已用德文译出，我那一篇见 *Saeculum VIII*, Heft 213. (196-209)

第九篇《公共工程》(《兴建考》)是一九六二年三月在巴黎法兰西学院(Collège de France)用法文作的演讲。这是戴密微教授给我安排的殊荣。学院规定必须用法文(巴黎大学可用英文)，每周一讲，共讲了四次(那一个月作为客座教授)，听众不少，行家很多。我的法文不够，写了英文稿，请侯思孟(Donald Halzman)博士译成法文，戴老亲自改定。读音请吴其昱博士指点，时时练习，幸未辱命。四讲之后，有当地东方学者数十位自费合请在美术馆设宴作贺，盛意可感。又以戴老的安排，把四讲印成一本小书 *Les aspects économiques des travaux publics dans la Chine impériale, quatre conférences* (法兰西学院，一九六四)。英文稿则直到一九六九年因戴老给我的《汉学散策》作序时提起才决定收入。今日中文稿得以问世，而戴老早归道山，请益无从。硕学盛德，令人追怀不已。

杨联陞 美国麻州阿令屯

一九八二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目录】

本书说明

自序

从历史看中国的世界秩序 / 1

国史诸朝兴衰刍论 / 15

附录：朝代间的比赛 / 32

帝制中国的作息时间表 / 44

附录：《习贾须知》/ 61

国史上的女主 / 66

国史上的人质 / 80

明代地方行政 / 94

中国经济史上的数词与量词 / 117

侈靡论 —— 传统中国一种不寻常的思想 / 127

从经济角度看帝制中国的公共工程 / 142

佛教寺院与国史上四种筹措金钱的制度 / 201

晋代经济史释论 / 220

会子形状考 / 251

二十四史名称试解 / 257

官修史学的结构

—— 唐朝至明朝间正史撰修的原则与方法 / 264

附录

杨联陞先生论著目录 / 283

从历史看中国的世界秩序

中国中心之世界秩序：神话与事实

有人常以中国之世界秩序为一以中国为中心的层级。理论上，此秩序最少有三方面是层级的：中国是内的、大的、高的；而蛮夷是外的、小的和低的。然而，对整个中国历史加以观察以后，即可发现这个多面的中国中心之世界秩序，是在不同的时间，从许多程度不一，甚至有时几近于零的事实上，建立起来的一个神话。

在东亚，中国以军民合一的力量无疑经常扮演一个领导的角色，但是不可就此推论，中国毫无其他文明国度存在的观念。汉朝史籍对文明的西方民族——大秦（大秦，字义上即伟大的中国），即极为赞扬。中世纪时，许多中国人崇拜印度，因为那是佛教的老家。又有许多时期，中国在政治上、军事上对待邻近的民族如平等之敌国，譬如：汉与匈奴；唐与突厥以及后来的吐蕃；宋与辽、金、元之间的关系都是如此。他们彼此还常常用一些亲属的称呼，如：宋帝与辽帝即以兄弟相称。不过，西元一一三八年，南宋高宗与金人媾和，却被迫接受臣的地位。后来他的继承人（译按：宋孝宗）把地位改善为侄，称金帝为叔，叔即父亲之弟。汉朝、唐朝为了维持边境的和平，常把公主或皇族的女子嫁给蛮族的领袖。每年还要送大量值钱的礼物给北方的邻族，名义上是经济援助，事实上从另一面看，就是朝

贡。“外国”一词，并不始于十九世纪而可以追溯到汉代。宋朝，“外国传”已成为史书中的一项。因此认为在西元一八〇〇年以前，中国没有国际交往的经验是不正确的。

无疑，中国在周朝后期曾有一些模模糊糊的国的观念。近代某些学者曾将春秋时代(西元前七二二——四八一年)的列国和近代的国际关系相比拟。战国后期(西元前四〇三——二二一年)，列强独立，不再尊周王。孟子说诸侯之宝三：土地、人民、政事时，其实就在为一个国家下定义。周代末期(至西元前二二一年)“天下”和“中国”之间有了区别，后者把边远的国家如秦、楚、吴、越排除在外。

中国的内服、外服也是一个值得注意的重要观念。传统上我们把这种观念推到渺茫的远古。夏、商时，据说有五服之分，而周有九服。九服或九极之最外者叫蕃服或蕃极。蕃字是草字头，蕃字另一个写法是草头水旁的“藩”字，意思是“屏藩，藩臣”。后来，草字头的蕃，也用做藩字的意思，指“外国的、蛮夷的”^①。

虽然这些周密的区分大部分是凭空虚构，但是似乎也反映了商、周时一个较合乎事实地内服——王畿，和外服——诸藩的划分^②。当然“内”、“外”只是比较而言，因此我们可以说内还可以有内，外还可以有外，一直分下去。由于军事、文化扩张

① 《尚书注疏》(《四部备要》本)，卷五，页六下；卷六，十七下——页十九；《周礼正义》(《四部备要》本)，卷五十五，页七——十；卷七十一，页十五下——十九下；《国语》(《四部备要》本)卷一，页三上下。又参见 John K. Fairbank, "A Preliminary Framework", *The Chinese World Order* (Harvard Univ. Press, 1963.), 页九。

② 《尚书注疏》，卷十四，页一下，页十一；卷十五，页二下；陈梦家，《殷虚卜辞综述》(一九五六)，页三一九——三三二；安部健夫，《中国人の天下观念》(一九五六)，页十四——三十七。

的结果，一些外服可以被并入内服，所有诸蕃都有变成外藩的可能，或者更通俗地说，所有生蕃都可能变成熟蕃。

然而，内外相对的用法，并不意谓中国和邻邦或藩属之间没有疆界。史书中有许多争论和解决疆界问题的例子。有一次汉帝（译按：汉元帝）曾提醒匈奴单于，边塞不仅是为了防外患，也为了防止中国罪犯逃逾边界。当然，边界不必常是一条线，它可以是一块双方都不准占领和垦殖的地带，也可以是一块其居民同属两国的地带，或一个缓冲国。中国皇帝也可能片面地宣布一个疆界，例如：据说宋太祖曾以玉斧在地图上沿云南大度河划一条线，宣称：“自此以外，朕不取”。王赓武教授也指出明太祖曾将十五个或更多的国家，包括朝鲜、日本、安南和爪哇等视为“不臣之国”，中国对他们将不加征讨^①。此外，还有一点须记住，文化的和政治的疆界无须一致。

讨论中国的世界秩序，尽可能分清神话与事实，当属重要，两者都可彼此影响。一个人可以说神话是一个文化的或心理的事实，但是无论如何要和政治事实分别清楚。

郭嵩焘：《绥边微实》

李雅各（James Legge）在一八七二年出版的《春秋左传》英译本序言中，曾严厉批评中国的官吏和人民不能够“了解中国仅是世界许多独立邦国之一的事实”（页五十二）。所幸也有少数例外，郭嵩焘（西元一八一八——一八九一年）就是其中最突出的一位。约于十九世纪中叶，郭嵩焘已经意识到中国处

^① 《明会典》（《万有文库》）本，卷一〇五，页二二八一。

在一个前所未有的国际局势里。在儒家传统中成长的他，很快就回到历史中，去寻找有用的教训。他将秦、汉以至明代的外交作了一次历史的观察，著成《绥边徵实》。其目的在纠正南宋以来学者虚文无实之弊。以下是摘自该书仅存的序文部分：

善夫班氏之论曰：圣王制御蛮夷，来则惩而御之，去则备而守之。其慕义贡献则接之以礼，羁縻不绝而常使曲在彼。自唐刘琨述武指驳班氏之失，以谓详而未尽，后世儒者，袭用其说，务为夸诞，而后汉、唐控制夷狄之大略绝于天下者七百余年。新莽（西元八——二十三年）时，严尤论御匈奴无得上策者，周得中策，汉得下策，秦无策焉。刘琨反之，以为周得上策，秦得中策，汉得下策。周世狃狄（一般认为是匈奴之祖）未至强盛，狄戎之难，平王东迁，遂丧成周，安得有策哉？

持论者徒曰间隔华夷，无穷兵而已。然不欲穷之于秦、汉强盛之时，而乃欲穷之于靖康、绍兴积弱之日，此又何说也？班氏之言曰播绅之儒，则守和亲；介胄之士，则言征伐。董仲舒大儒，魏相名臣，皆播绅之儒也。南宋之初，言战者一出于播绅，而韩世忠、岳飞之流，犹断断然能以战自效。继是而文吏高谈战略，武夫将帅屏息待命，神沮气丧，功实乖矣。

是以宋明之世，议论多可观者，而要务力反班氏之言，常使曲在我^①。

郭书据说共二十四卷^②。假如此书仍存，且能印出来，无疑是一本有趣的书。现在我们可以进入本文的主要议题了：古典儒家应付非我族类的传统，帝国时期对绥边的见解，尤其是羁縻政策^③。

① 《养知书屋文集》，卷三，页十五下——十七下。

② 据王先谦撰郭嵩焘之神道碑铭，见郭嵩焘著《玉池老人自叙》卷首。

③ 关于郭嵩焘，参见：A.W. Hummel, ed, *Eminent Chinese of the Ching Period* (1943), I, 438—439 (by Tuiien-che); S.Y. Teng and J.k. Fairbank, *China's Response to the West: A Documentary Survey, 1839-1923* (1954), pp. 99-102; 和 David Hamilton, "Kuo Sung-tao: A Maverick Confucian," in *Papers on China*, 15: 1-29 (1961) 这三本书都没有提到郭嵩焘写的《绥边徵实》。（转下页）

古典儒家应付非我族类的传统

孔子的时代，中国已经有了上千年的文化，也累积了可观的政治的和社会的经验。这个背景最少能部分地说明春秋时期的人，对战争和蛮夷所持的相当成熟的见解。在儒家经典《左传》中^①，我们可以分出两种趋向，一是以绥靖，一是以战争为对付蛮夷最有效的办法。由下面的例子，我们不难发现，多数的意见都混杂有份量不同的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诱服和威迫。由于这些典故大部分都是我们所熟知的，它们说明了可以被用来征引的典故之间的差异性。

A 绥靖论

(一)“臣闻之，招携以礼，怀远以德，德礼不易，无人不怀。”(《左传》，页一四九，管仲曰)

(接上页③)Hamilton 书第十八页，将“国体”一词视为与儒教秩序(Confucian Order)同义，此说并不误，但为一哲学上地误解。严格而言，国体一词仅指国家基于体制之尊严(体统或体面)。同样地，政体仅指政府的尊严。最少郭嵩焘时代通常是这样用法。国体、政体用来指政治结构或制度要迟至清末君主立宪或民主立宪问题发生后始出现。

① 本文所有经书皆采李雅各之译文，但改用 Wade-Giles system 之罗马拼音法。以下引文见李雅各译《中国经典》The Chinese Classics 卷五：《春秋左传》(London: Henry Ercwde, 1872; reprinted Hong Kong Univ. Press, 1961); 卷一：《论语》、《大学》、《中庸》；卷二：《孟子》，修正第二版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893 and 1895; reprinted Hong Kong Univ. Press, 1961)。